

书人絮语

用故事传递精神，以情感连接历史

——评报告文学《魂筑井冈》

□饶道良

笔者从事井冈山斗争历史学习研究以及井冈山精神宣传30多年，读过很多关于这段历史的文献史料、口述资料、学术专著等。当我手捧旷胡兰编著的《魂筑井冈》时，仍然感到眼前一亮。市面上有很多研究历史的作品，只为研究而研究，停留在象牙塔里。有些写历史的文学作品又夹杂太多的演绎，读来让人不太放心。《魂筑井冈》没有停留在对历史事件的平铺直叙，也没有陷入学术研究的晦涩枯燥，而是以作家的细腻笔触、研究者的严谨态度，将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转化为一个个有血有肉、可感可触的生命叙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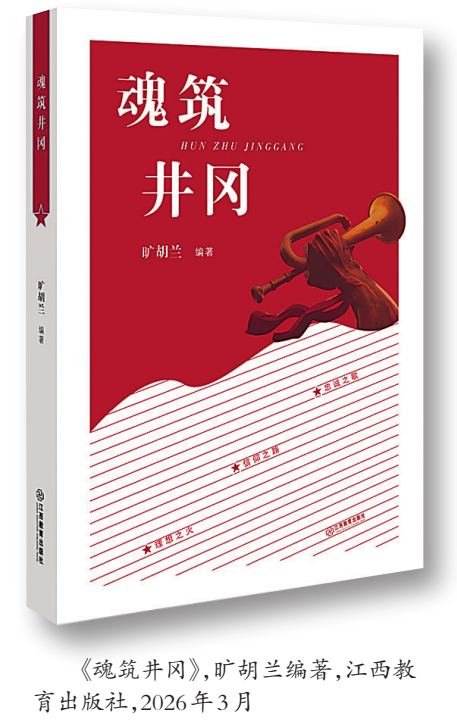
旷胡兰生长于井冈山地区，这份与生俱来的乡土情怀，让她对这片红色土地有着旁人难以企及的情感联结。在“写在前面的话”中，她讲述了自己几十年间无数次登上黄洋界、探访茨坪与茅坪等地，走访烈士后代的经历。当然，她也多次与我面对面或微信或电话探讨过很多历史细节。特别重要的是，她的这种“沉浸式”的创作准备，让《魂筑井冈》摆脱了“纸上谈兵”的局限。她不是在复述史料，而是在收集、整理、阅读大量史料的基础之上，打捞被岁月尘封的生命故事。袁文才的女儿女婿拿出的老照片，王佐后人讲述的家族往事，李筱甫孙子回忆的先辈义举，这些第一手的口述史料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，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。

全书以“理想之火”“信仰之路”“忠诚之歌”三个篇章架构，逻辑清晰又层层递进，完整呈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创建到发展、从坚守到传承的全过程。第一卷“理想之火”中，作者没有把龙超清、袁文才、王佐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人物塑造造成天生的革命者，而是还原了他们的成长轨迹。龙超清出身官宦之家，却毅然放弃优渥生活，秘密创建当地最早的党组织；袁文才遭遇夺妻杀母之仇，从绿林好汉成长为红军将领；

王佐从裁缝学徒起步，在革命浪潮中实现华丽转身。作者细腻地描绘了他们在黑暗中求索、在困境中抉择的过程，让我们看到，革命理想不是凭空产生的，而是在对不公命运的反抗中、在对光明未来的憧憬中逐渐点燃的。我特别注意到，作者对“大仓会见”这一关键历史事件的刻画。她没有像一般书中描绘的那样，简单将其定性为“鸿门宴变成同心宴”，而是通过细节描写，展现了袁文才的疑虑与试探、毛泽东的坦诚与远见。

第二卷“信仰之路”聚焦井冈山斗争的艰难岁月，既书写了黄洋界保卫战、龙源口大捷等军事胜利的壮阔，更着力刻画了“打破经济封锁”背后的坚韧。作者用大量笔墨讲述了红军造币厂的谢官龙兄弟、大陇红色圩场的少先队队长朱盘生、小井红军医院的医护人员和伤病员的故事。这些看似平凡的人物，在缺衣少食、缺医少药的极端条件下，用智慧和勇气支撑着革命根据地的运转。谢官龙兄弟用简陋工具铸造“工字银元”，为根据地经济注入活力，最终为保护银元献出生命；朱盘生年仅14岁，却带领少先队员们守护圩场秩序，识破敌人破坏阴谋；张子清师长把珍贵的食盐留给重伤员，自己却因伤口感染牺牲。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让我们深刻认识到，井冈山斗争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，更是信仰的胜利、民心的胜利。在描写黄洋界保卫战时，作者详细介绍了“竹钉阵、壕沟、竹篱笆、滚木擂石、射击掩体”五道防线的构筑过程，还原了军民同心、众志成城的壮阔场景。更难得的是，她收录了当年红军战士自编的《空山记》：“我准备着南瓜红米、红米南瓜，‘犒赏’你的众三军”，这种充满乐观主义的细节，彰显了革命者在绝境中依然昂扬的斗志。

第三卷“忠诚之歌”是全书最让人动容的部分。作者将笔触对准了那些女性英雄，



让吴月娥、龙关秀、聂槐妆、王石妹等女性革命者的形象熠熠生辉。吴月娥为掩护战友，与敌军军官同坠悬崖；龙关秀冒着生命危险，在冰雪之夜为赤卫队员送粮，最终被敌人残酷折磨后活活冻死；聂槐妆用盐水浸衣的巧妙办法为红军送盐，遭受酷刑却坚贞不屈。这些在当时都是不满20岁或者刚刚20岁出头的女性，以年轻的柔弱之躯承载起革命的重量，用生命诠释了“忠诚”二字的内涵。书中对“发不出去的大洋”的描写，让我心中的沉重久久挥之不去。彭德怀率领红五军重返井冈山时，准备用2000块大洋救济百姓，却只发出800多块——因为茨坪和大小五井已有1000多名群众惨遭杀害。这个

细节以最朴素的数字，展现了井冈山人民为革命付出的巨大牺牲。

作为熟知这段历史的一位研究者，笔者特别赞赏作者对历史复杂性的把握。书中没有回避宁冈土客籍矛盾这一敏感问题，详细描写了文根宗作为土籍县长，在矛盾漩涡中坚守革命立场，最终不幸牺牲的悲剧。这种不回避历史争议、不美化历史进程的写作态度，让作品更具深度和可信度。同时，作者对“八月失败”等历史挫折的描写，也展现了客观公正的历史观。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正是这些挫折与牺牲，才能凸显信仰的坚定。

《魂筑井冈》的价值，还在于它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对话。作者在讲述历史故事的同时，也描绘了如今井冈山的新面貌：大仓村的木质廊桥象征着永恒的握手，龙源口的纪念碑矗立在绿水青山间，小井红军医院旧址成为缅怀烈士的圣地，井冈山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迈入小康，过上了红火日子。这种今昔对比说明了，井冈山精神始终滋养着这片土地的活的灵魂。正如作者所说，井冈山的红杜鹃年年盛开，正是革命先烈的忠魂在守护着这片土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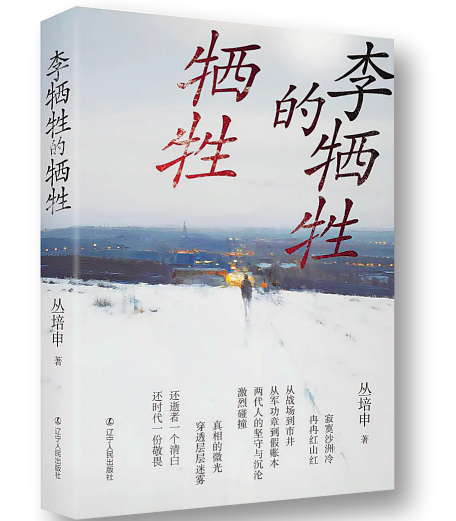
井冈山斗争历史是中国革命史的开篇华章，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是我们的宝贵财富。长期以来，如何让这段历史被更多年轻人了解、认同，是我们历史研究者面临的重要课题。旷胡兰的《魂筑井冈》给出了很好的答案：用故事传递精神，以情感连接历史。在当前传承红色基因、弘扬革命精神的时代背景下，《魂筑井冈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井冈山精神是应对风险挑战、砥砺奋进的强大动力。书中人物展现的理想信念、担当精神、为民情怀、斗争智慧，依然是我们今天不可或缺的精神滋养。

（作者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副馆长、研究馆员）

现实主义文学的价值，向来在于以人间烟火映照时代肌理，以日常事件解剖社会现实，以个体命运悲欢叩问世道人心，这是极具温度与力量的创作路径。从培申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李牺牲的牺牲》以2001年沙洲市一场离奇车祸为叙事原点，围绕老者李雪芹蒙冤离世一案，搭建多层交织的叙事脉络，将案件侦破、舆论反思、权力审视、人性救赎融为一体。作品以“寻找”为精神母题，层层递进、徐徐铺展，在善恶博弈、命运浮沉中，重新定义了平凡人的“牺牲”价值，兼具故事感染力与思想穿透力。

一部优秀的小说，标题往往是解码其精神内核的第一把钥匙。该作主人公本名李雪芹，“李牺牲”并非世人赋予的英雄称号，而是乡土邻里沉淀半生的朴素评价。村里人称他为“李牺牲”，只因他一辈子肯扛、肯扛、肯助人，从未为一己私利而活。不同于以往创作中赴汤蹈火、建功立业的宏大牺牲叙事，作者剥离“牺牲”一词的固有认知，将其拉回人间，落脚于普通人日复一日的向善隐忍。李雪芹一生清贫庸常，无高光事迹、无显赫身份，平日里行善不求回报，遇事退让包容，直至车祸瞬间舍身救下陌生女童。小说跳出功利化叙事，扎根普通人的现实生活，具备直击人心的共情力量。

长期以来，社会问题类现实主义小说普遍存在两类叙事短板：一是刑侦悬疑类单线平铺直叙，重案件推理、轻时代反思；二是某些现实题材作品主线直白，批判流于表面，情感脉络单薄，可读性与思想性难以兼顾。《李牺



牲的牺牲》的创新在于搭建了明暗嵌套、支线互补的网状叙事结构，兼顾剧情张力与思想深度，实现了叙事美学的突破。

多年前参加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年会时，与上海作家安谅相识，其时便对他创作的微型小说印象深刻。后来我在《雨花》杂志担任主编，编发过安谅的不少作品，其中许多篇目被《小说选刊》转载，既助力了我们的工作，也扩大了杂志的影响。文学评论家王干曾评价安谅的微型小说：“有的看似微小，其实是重大的题材，内涵意蕴丰富。”如今捧读安谅新近出版的微型小说集《每个人的图解》，这种感受愈发强烈。

经济学博士出身的安谅，曾在学校、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工作，却数十年如一日坚持文学创作，已出版文学著作30余部。如此跨界而勤奋的创作姿态，本身就需要相当的定力。安谅自称“业余作者”，这样的定位并非谦辞，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认知——文学创作不是换取世俗名利的工具，而是“滋养自己，回报生活”的方式。这种“业余”姿态恰恰赋予他超越功利的创作自由。微型小说属于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，要在千余字的一方寸之间表现具有时代意义的故事，没有深度的提炼和精当的剪裁，难以出精品。安谅以业余之身行专业之事，正是文学自觉的体现。

书名“每个人的图解”暗示了这部集子的核心方法论。同名篇目的情节耐人寻味：同学群中因淄博烧烤、街头设摊等琐事争论不休，明人用一张晒紫薯干的照片——老农在自家门口的路边晾晒紫薯——给争论画上句号。同一张照片，有人看到的是海洋，

有人看到的是天空，各执一词。明人借此说明：局部、视角、距离是客观因素，每个人不同的心理认知也会造成“先入为主的误区”。这个寓言式的结构揭示了安谅创作的深层意图：写作即图解，图解即认知世界的方式。

同一段生活素材，在不同作家笔下呈现迥异的形态；同一个人物，在不同的解读中折射出不同的光谱。安谅像一位手工艺精湛的拼图师，将散落在生活各个角落的碎片拾缀起来，用文学的黏合剂拼贴成一幅当代生活的图景。

安谅善于从日常的场景中开掘深层的伦理意涵。《在地铁上》以地铁车厢为舞台，上演一出道德困境剧：明人主动让座的善意，在众人的道德审判中被扭曲变形，一个让人温暖的行为变成了被审视的对象。安谅的高明之处在于，他并非简单批判谁对谁错，而是冷静地呈现人性深处的复杂脉动——围观者的道德亢奋、被让座者的尴尬、让座者本人的困惑，共同构成了一幅当

长篇小说《李牺牲的牺牲》：

向善而行，便是最好的人生归途

□林 磊

作品以冤案平反为显性主线，遵循清晰的现实逻辑铺展剧情，叙事节奏张弛有度，摒弃国产悬疑作品泛滥的强行反转、刻意制造悬念的套路。整场查案过程没有金手指式的破案奇迹，只有反复走访、证据复盘、多方博弈的艰难求索，还原基层办案的真实困境，保留现实主义创作的质朴质感。支撑整部作品思想厚度的是三条缠绕共生的隐性暗线。其一为父辈革命情谊情感线，宁小小母亲与李雪芹尘封多年的辽西旧事；其二为利益捆绑权力线，揭开核心真相；其三为众生浮沉人性线，描摹各色人物的欲望、挣扎与无奈。与此同时，多条市井支线填充故事肌理，串联起现实生活中各行各业的图景。这种明暗交织的叙事手法，既规避剧情空洞化，又很好地平衡了通俗可读性与文学思辨性。

人物扁平化、脸谱化，是当下一些现实题材创作中的通病，正面角色完美无瑕，反派角色纯粹恶毒，人物动机单薄、人性层次缺失，难以引发读者共鸣。《李牺牲的牺牲》采用全景式群像书写，打破非黑即白的塑造逻辑，角色皆背负困境、裹挟与执念，在善恶

拉扯之中，尽显人性面貌。

作为全书核心的李雪芹，全程弱化主角光环，从不对抗世俗纷争，却用一生行善构建道德标尺；猝然离世、背负污名，未曾留下一句申辩，却倒逼世人自省良知。该小说刻画的女性群像，也跳出悲情工具人、辅助配角的设定，撑起全书骨架。宁小小、李芳蕊、陈明霞、吕红姐四人分属不同阶层、遭遇迥异，却都坚守道义，让现实批判不失人文暖意。

优秀的现实题材小说，从不止步于还原旧事，而是借过往映照当下，回应社会命题。《李牺牲的牺牲》落笔于2001年，书写的却是时至今日依旧值得警醒的现实问题。作品向读者发问：时代飞速向前，物质日渐丰盈，我们是否丢失了向善、共情、坚守本心的良知？李雪芹的命运证明了，善意看似脆弱，但向善的力量永不消亡。总有普通人逆流而上，追索真相、守护公道，维系社会运转的温度。纵使前路浮沉，向善而行，便是最好的人生归途。

（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党委委员、常委、副校长）

折处，而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。微型小说的篇幅限制非但没有成为安谅写作的障碍，反而逼出了他提炼生活本质的能力。

安谅的“明人日记”系列是其创作的核心架构。主人公“明人”既是故事的亲历者，也是一双观察的眼睛，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记录者。他穿梭于100多个故事之间，每一次遭遇都生发些许感悟。有论者将安谅的“明人”与冯骥才《俗世奇人》中的“奇人”对比：冯骥才笔下是手上有绝活的“俗世奇人”，而安谅构建的是“魔都”上海中世事洞明的“明人”——靠的不是绝技，而是对人情世故的深刻体察。如果说冯骥才为天津卫画像用的是“回忆”的笔法，安谅则用的是“日记”的笔法，更多了烟火气，记录得更加忠实。

在微型小说这种文体上，安谅的写作体现出非常独特的品质，即作家对自我和他者之间关系的把握，这使他具有了文学史的自觉意识。他不是偶然为之的写作者，而是带有明确文体意识的探索者。读安谅的小说，有一种莫名的熨帖感。百余篇作品勾勒的世相，像是将生活的一帧帧瞬间定格，再串联成一整幅当代风俗画。这些作品“以小博大、立意高远、气象万千”，用千余字的篇幅承载了普通人的悲欢离合、世道人心。他的写作印证了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：“文学的特质是温暖人心。”

（作者系文学编辑、文学评论家）

书香茶座

非虚构写作的别样文本

——读长篇纪实散文《富裕的河流》

□周 敏

在当下百花齐放的非虚构写作格局中，尤其是在地域书写、乡土写作与文化大散文的创作语境里，杨占武的散文有着相当高的辨识度。他既跳出了传统文化散文的怀古抒情套路，也区别于当下流行的乡土随笔，走出了一条兼具在地温度、文史厚度与现实力度的新路径。这一独特性在其长篇纪实散文新作《富裕的河流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
《富裕的河流》以黄河几字弯区域的历史与现状为对象，通篇建立在作者对该区域的实地考察及文史考据上。读解这部作品，“走”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。正如该书后记所说“脚不到的地方不写”，杨占武的文字底色正来自于其与脚下大地的血肉联系。在文化大散文的当代脉络中，边走边看、边看边思、思感相生，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常态，最典型的莫过于余秋雨的“文化苦旅”。但杨占武的“走”却不同于“旅”，因为“旅”意味着一种“局外人”的身份与视角，旅者来到陌生之地，尽管可能带来独特的视角以及滋生别样的审美，但总也摆脱不了“过客”与“隔阂”，有“匆匆”之感；而“走”则是“置身事内”，兼具考察与扎根之意，是长期、反复与磨合的，念兹在兹，必有回响。

杨占武是黄河几字弯区域的在地者、亲历者与回望者。他扎根于地域，受地域滋养，又通过兼具学术性与审美性的文字，反哺于地域。在该书中，常常能看到作者从多样的视角（如不一样的高度、位置、季节以及不同时空中不同人的眼光）看同一个事物，力求穷形极状，这就和旅者的走马观花、借景生情有着显见的差异。景在杨占武的笔下，有了不可动摇的本体性。或者用当下时髦的一个词来说，是“具身”的，而不仅仅发挥“起兴”的作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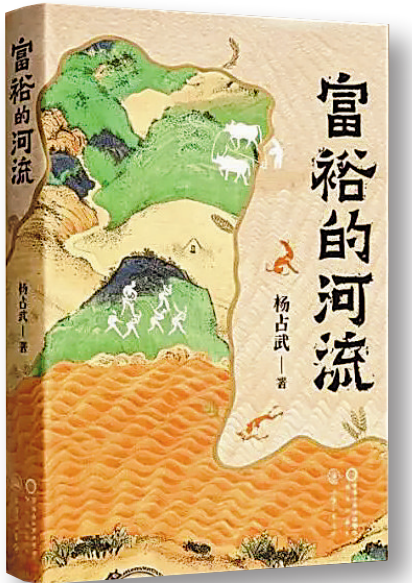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旅者而言，景还需要具备知名度、观赏性乃至奇异性，才能构成对五官和心灵的冲击。有学者说，现代人看风景，一方面会抹除它的社会实践痕迹，使其成为纯粹审美的存在，另一方面则将主体投射其上，让风景内在化，用来映照人的心情、感伤、思绪，最终构成人与风景的闭环。不得不说，现代社会风景的发现，释放风景审美价值的同时，也确实让其扁平化与封闭化。《富裕的河流》是对风景的还原，还原到风景所应该在的社会生活实践中，从而重构风景的意义。杨占武看黄河几字弯，想到最多的是灌溉和水利。该书最让笔者感动的一段文字是：“对于我这样生长在黄土高原干旱带、习惯用窖的容量来度量水的人来说，看见河水汤汤，第一反应是：如果用它浇地就好了。”

正因此，我们在杨占武的文字中看到的与其说是景，不如说是“环境”、“地理”、“民生”，是人与地域的关系，后者完全无法被“景”所覆盖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尽管该书纵横古今，文史信手拈来，考证考辨拾皆是，但却突破了通常意义的“文人之文”与“学者之文”，带有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特性，从而有很强的“及物性”。而且由于是“文明内部的发言人”，作者又与土地有了天然的情感联系。

这种情感是朴实而克制的，不像文人、学者式的自我欣赏。设身处地是这种情感的基底，它指向的是“理解与尊重”。例如，对于想“搬出去”的河湾居民，作者鲜明地表示，“绝不会像一些所谓的人类学家那样，希望他们忍受生存的窘迫而成为河湾的‘原住民’标本”。正因如此，作者并不会因为对扎根之地的熟悉而形成指点江山的豪情，其字里行间所透出的多是祈盼、怜悯、不忍与虔诚，有着明确的自我边界。其中自有对于“苦”的慨叹，却是微观而具体的，而且往往由于不忍而用“冰山”笔法，点到即止。正如他在两年前发表的《窖子的臆史》中所说，“这是不能诉说的‘心史’，伤痛深入骨髓而无以言说，宁肯付之阙如”。

这种情感也不同于新大众文艺语境中地域书写的私人性与日常性、公共性、社会性、文化性又是其主调。“走”也内在地包含了认知的不断丰富与深入，以及个体社会经验的成长。在有意行走中，杨占武将个体故土记忆“升维”成地域文明档案与时代社会记录。这种兼具文史厚度、社会视野与现实担当的文字，也为当下新大众文艺语境下的非虚构写作提供了别样的范本。

（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媒学院副教授）



《富裕的河流》，杨占武著，阳光出版社、上海三联书店，2026年7月



《富裕的河流》插图 周一新 绘